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研究：宏观背景、 学科内涵及未来走向

丁柏铨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应用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与经济社会、与新闻实践同步发展，学科内容日渐充实，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成绩。中国新闻学的发展有着宏大而深厚的背景。新闻实践的发展为中国新闻学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中国新闻学的重要内容。新闻史学研究领域拓展且体现出相当深度。未来的走向：一是与传播学协同发展；二是建构更具科学性的学科体系；三是进一步提升对决策部门、新闻业界、其他学科和教学对象的影响力；四是探索新闻学学科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新闻观；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8)05-0124-11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5.012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社会工程的序幕。40 年来，中国新闻学及其各分支学科与经济社会、与新闻实践同步发展，学科内容日渐充实，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成绩；当然，也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将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中国新闻学研究进行回顾考察，并探讨未来的发展路径，以期对新闻学学科建设有些许帮助。

一、中国新闻学：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发展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的发展，有着宏大而深厚的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此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所有这些，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宏大而深厚的背景，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同时也成为该学科的研究内容本身。

（一）对作为背景的政治生态的考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从致力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致力于纠正“文革”的错误，致力于拨乱反正，到致力于民主与法制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再到依法治国，通过上述努力，促使政治生态日渐优化。

十一届六中全会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决议，从而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历史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新闻舆论观研究”（16ZDA215）

作者简介：丁柏铨，三江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大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并共同有所遵循。这对于新闻学而言无疑非常重要，关乎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中认识符合实际和合乎真理的问题。这是政治生态建设的认识论基础。

十三大在推动政治生态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十三大报告作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有利于新闻业界和学界人士对社会大势进行准确把握，明确新闻事业和中国新闻学所处的历史方位。报告中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重大命题，不仅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知情权的尊重，而且对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体现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大进步。这为新闻媒体通过报道披露人民应知的信息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而“舆论监督”概念和使命的提出，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乃至在党的历史上均为首次。此后，舆论监督作为社会监督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并成为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方面的重要职责，在政治生态优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学理层面来说，舆论监督由此取代了批评性报道的概念。它更具有概括力，内涵也更丰富。可以说，舆论监督已然成为中国新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十四大报告强调要强化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舆论监督，同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对舆论监督都有所强调。十七大提出人民“四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较之十三大又进了一步。而人民的参与权和表达权都与新闻媒体密切相关，要求媒体当好人民代言人（此为代言），与此同时，也要为人民在媒体上提供直言的机会（此为直言）。多年来，舆论监督成为政治生态建设中的重要抓手。

2002年5月31日，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首提政治文明。这具有重大意义。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层面的内涵。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生态建设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据此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极端重要性。此决定对于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在于：领导干部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的能力，成为其执政能力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政治生态的优化在情理之中。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成为新闻学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内容。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政治生态建设。他在2015年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说：“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①引人注目的是，习总书记特别提到了政治生态污浊的危害性和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危险性。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得到强调和贯彻，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体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力度。党的政治建设被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持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②。其间，法制建设有了更大进展，新闻法治更受重视。

正是在上述过程中，中国新闻学研究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得以不断趋于优化。

（二）对作为背景的经济因素的考察

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的背景中的如下特点不可忽视：首先是自十一届三中全

^① 参见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322/c1001-29160159.html>。

^②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913/c1001-29531815.html>。

会始,发展经济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被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当时的流行语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经济活动、经济建设、经济成就成为新闻报道的经常性的重要内容。其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经济体制本身,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所有这些都会在报道者、报道对象、报道内容等方面得到体现,从而也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中国新闻学的研究中。再次是经济全球化浪潮激荡,中国融入其中。在这一浪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市场”有了新的发展。在此情势下,一国不可能远离世界市场而孤立存在。最后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主动地接受西方经济的辐射和随之同步而来的西方文化的辐射。在此背景下,不仅新闻报道的内容与经济联系密切,而且中国新闻学研究也常常不能不受此影响。

在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之后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真谛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新闻本体、新闻媒体、新闻事业、新闻实践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受众在媒体面前的身份,使之极大地增加了在信息接收环节乃至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权重;新闻媒体或直接进入了市场,或与市场有了这样那样的紧密联系,其属性中具备了与市场相对应的部分;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市场经济使新闻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使中国新闻学因之而面临许多新的课题。

(三) 对作为背景的文化元素的考察

从文化的角度看,国门打开以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背景中的如下特点值得重视:“西学东渐”成为必然,西方的学说大量进入我国,西方的文化元素得以涌入中国国门。其中,有大量的文化元素可以成为我国各学科发展中可以汲取的营养。与此同时,“东学西渐”、中国的文化元素传播到世界各国的力度较之过去也有所增大,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后,就更是如此。由此,东西方文化之间频频交流、每每交融、多有交锋。其中的交锋不乏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就总体情况而言,国际舆论环境是“西强我弱”。在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中,对此应保持清醒头脑。

在文化元素中,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作用和价值不容低估。习总书记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对我们来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① 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新闻媒体的神圣使命,应该也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支撑点。

文化中涉及传播科技的部分,包含了活跃的、富于创造性的文化元素,且与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的关系特别紧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崛起,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接受信息的传统习惯,颠覆了原有的社会舆论格局和话语格局(人们手中握有处于移动状态中的“麦克风”,从理论上说随时随地有可能成为舆论始发点和舆情引爆点),变革了新闻业的业态、新闻产品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使新闻有效传播和舆论有效引导的难度陡然增加。随着传播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国新闻学增添了许多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学,就是在上述宏大而深厚的背景下存在和发展的。

二、新闻实践的发展: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原动力

40年来,新闻实践永不停步地发展,为中国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应用新闻

^① 参见《习近平谈文化强国建设:抛弃传统就等于割断精神命脉》,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1128/c385476-28901100.htm>。

学乃至整个中国新闻学从新闻实践中获益颇丰。

（一）生生不息的新闻业务改革实践成为新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改革开放之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新闻界对“文革”中的新闻实践和新闻观念进行拨乱反正。“四人帮”设置的思想樊篱被破除，新闻界人士的思想认识和新闻实践回归到真理性的轨道上来。新闻媒体确立了正确的功能观；信息论被引入新闻学研究中；在“文革”中受压的经济新闻得到倡导；“假、大、空”恶劣文风被清算；体现“真、短、快、活、强”清新文风的新闻作品受到推崇。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新闻实践的景观，也是应用新闻学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的起点。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晚报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报业结构；90年代中期以《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报的崛起，成了一种现象级存在，为报业增加了新的报纸类别，为新闻学增添了新的研究对象。而各级党报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负重前行、锐意改革，历经了由宣传纸到新闻纸的变革。关于民生的报道不断得到加强。电视媒体上融叙事与评论于一体的访谈类节目出现并趋热（其中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央视“焦点访谈”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广播媒体发挥自身优势注重与听众的互动，广电媒体的直播被频频采用。这些都表明媒体受众意识的增强和传播手段的进步。对于新闻实践的发展和变动，新闻传播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不乏有学理深度的成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全社会带来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给新闻事业带来的变化主要有：新闻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与市场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可以有程度的不同，但在存在联系方面是无一例外的；同行之间存在竞争且竞争愈演愈烈，有时甚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例如当年的“报业大战”就是如此）；受众有了消费者的身份（新闻产品的消费者），他们在选择新闻媒体及新闻产品方面有了更大自主权，有了决定权。这是媒体进行新闻业务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新闻传播学者对主流媒体改革、受众心理、媒体竞争、新闻业务各个方面的研究得以开展并渐趋深入。

在传播高科技驱动下，新兴媒体发展迅速，受益于此，新闻业务改革创新风生水起。互联网给新闻业务带来许多新景观。在上网的新闻中，链接发挥了很大效用，给用户带来了很大方便；网络在新闻传播中得到普遍应用，网络新闻学应时而生；在大数据时代，新闻业界出现了数据新闻，央视制作并播出过“据说春运”；算法被用于新闻产品推送，由此可做到“千人千面”；机器人写作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应用；区块链对新闻领域也有所涉足。传播高科技推动新闻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业务。对于新闻的这些新业务，新闻学者都进行了相应的学理研究。有研究机构指出：“现阶段，无论是自动写作软件、还是视频自动剪辑，都不过是对传统新闻从业者的初级拟态，从这一点看，人工智能短期内取代的主要是菜鸟写手，媒体老炮们的地位依旧岿然不动，理论上不会引发新闻业大规模的失业浪潮。但是，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加速进化，发展出不同于图灵机之外的技术逻辑，那才是新闻业真正的凛冬。”^①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此论在唤起新闻业界和学界人士对人工智能融入新闻实践应予以关注方面不无意义。

与新闻相关的学术争鸣既和新闻业务有关，又往往超出了新闻业务的范围。例如，1997年关于“新闻策划”的争论，数次关于新闻改革的讨论，去年关于算法与内容的争论，大致都是这样。“新闻策划”的概念是由新闻业界人士首先提出的，此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人们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新闻需要策划；另一种意见认为：新闻岂能策划；再一种意见认为：不仅报道可以策划，新闻事实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策划的。虽然人们并没有通过争论完全达成共识，但争论本身对于学术的发展是颇具意义的。

李良荣教授撰文论析过在1978至2008年的30年中中国新闻界关于新闻改革的三次学术大讨

^① 腾讯研究院：《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业的谢幕与重生》，<http://www.tisi.org/4906>。

论。这三次大讨论并非由领导机构有意识地组织，而是自发的，是在新闻改革的探索中、在新闻的实践中因遇到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而必然产生的。三次大讨论，都是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在思想的碰撞中迸发出一系列的创新理论，从而带来观念的革新，推动实践的发展，促进新闻改革高潮迭起^[1]。

关于算法与内容的关系的讨论，也很引人注目。今日头条以算法用于内容推送，由此可以借助于大数据技术而做到推送给受众的新闻是“千人千面”的。与此相联系，有一种说法叫“我们只做新闻的搬运工”。而人民网评则对上述说法予以批评和纠正，提出：“‘算法推荐’不能成为传播低俗信息的助推器。”^①这场讨论有利于厘清内容与算法（进一步说甚至是技术）之间的关系。

新闻实践的变化发展，其直接动因来自社会生活，来自受众。社会生活是新闻反映的对象。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动，新闻实践不可能凝固不变；而受众则是新闻有效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或顺应受众需求，或由受众需求倒逼，两者都会使受众发挥对新闻实践的强大推动作用。十八大以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十九大报告中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学的影响是：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必须对人民和人民利益更加重视。

（二）与时俱进的新闻经营管理实践为新闻学带来新的研究课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是经营主体，传媒经营管理被理所当然地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媒体须处理好如下关系（或是此前虽也存在但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或是前所未有）。具体而言，是这样三组关系：

一是自身与受众的关系。受众的地位提升了，不再是宣传教育的对象，而成了新闻媒体的服务对象，甚至成了媒体的衣食父母。媒体失去受众，损失巨大：媒体生产的新闻产品无人问津，这就意味着失去市场份额和市场影响力，接踵而至的是无传播力、引导力可言，广告等收入也会急剧下降。学者们充分注意到：新闻媒体对受众所进行的有效的舆论引导，是蕴含在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的过程中的，是在受众接受媒体提供的优质服务中实现的，是润物无声式的。

二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是经营主体，在经济效益方面的正当追求受到法律法规和社会共识的保护。相当一部分媒体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市场。这是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之处。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不无矛盾，应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两者统一。这是一组前所未有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一组关系，既有能力问题，更与责任心、使命感有关。

三是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既然是经营主体，那么它们必然就具备了产业属性。1996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建立，是开先河之举，标志着传媒成为一种产业，须按现代企业进行管理。后来传媒集团达到了一定数量。它们在各级新闻媒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传媒集团的学术研究，既涉及新闻媒体，又涉及传媒经济，成为新闻学中与经济紧密关联的一个研究方向。显而易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除依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外，还有着产业属性。它们已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联系，对新闻媒体的管理，除了有对舆论工具进行管理的一面，也还有按产业进行管理的另一面。既不能无视媒体生产的许多新闻产品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不能忽视“党媒姓党”这一重要问题），也不能忽视新闻媒体具有的产业属性。这是对新闻媒体管理一度采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表述的依据。

（三）不断探索中的媒体融合实践为新闻学提供新的研究对象

中国于1994年接入互联网。经20多年发展，网民由数百万遽升至今日的8.02亿（其中手机网民占绝大多数）。在实现移动互联后，网民可方便地、随时随地地在移动状态中接受信息和发表

^① 参见 <http://news.163.com/17/1229/22/D6RVPBU5000187VE.htm>。

意见。公众在移动状态中接受信息，以致使传统媒体的受众大量流失，出现“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习总书记语）的严峻局面；在移动状态中发表意见，无异于人皆有处于移动状态中的发声器，由此改变了社会话语格局和舆论格局。网民成舆论始发点和舆情引爆点具备了可能性。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意见领袖和网络水军在网络条件下得以形成。对前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将发挥正能量作用的意见领袖与发挥负面作用的意见领袖混为一谈；而后者则往往为商业利益所裹挟，在舆论场中往往发挥搅局的作用。由此，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势在必行。针对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的现状，传统媒体“触网”是最初选择，之后历经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再到在诸多方面“深融”。在此过程中，传统媒体由办网页版，到发展“三微一端”“中央厨房”，再到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探索媒体融合规律——可以说，媒体融合正在逐渐成为新闻业界人士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

而在另一些场合，微信（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包括官方微博）经常被用来发布新闻和进行新闻传播。其主体并非新闻媒体，而是官方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甚至是个人。这应该是新闻传播的一种延伸。对此所作的研究，相应成果中既有实践内涵，又有学理内涵。

综上，活跃的、充满生机的新闻实践，总是为新闻学研究提供来自一线丰富鲜活的内容；而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也总是不负众望，根据不断发展的新闻实践进行思考并提供着新的研究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新闻学的重要内容

在新闻理论（理论新闻学）研究方面，40年来成果累累。研究者们对于新闻商品性、新闻定义、新闻本体、媒体功能、新闻价值、新闻规律、媒介素养等重要问题都有所涉及，且体现了一定的学理深度。这里主要说一说4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其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新闻舆论理论与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新闻舆论工作一如既往地重视，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发展。上一个世纪80年代末，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对新闻舆论工作历史教训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重要命题。舆论导向对受众、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抑或负面影响都相当大，这是因为舆论能影响人心的向背和聚散。舆论导向正确，能使人心“向”和“聚”；舆论导向错误，会使人心“背”和“散”。1994年1月，江泽民又提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1996年9月26日，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他还提出过衡量舆论导向的五条标准，提出“讲求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的要求。这样，“舆论导向/舆论引导”论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于2008年6月20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这是著名的“利误”论。他要求“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这不仅是针对新闻工作者而言的，而且也是对执政者、管理者提出的，与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相对应的要求，也是就舆论引导乏力、乏术现状提出的具有很强针对性的要求。

习总书记在前述基础上将“舆论导向/舆论引导”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在2013年“8·19”讲话中提出：“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时、度、效”，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时”涉及时效、时机和时宜；“度”涉及对分寸的把握；“效”是要实现的目标。既需要以“效”为出发点和归宿考量“时”和“度”；也需要从“时”或“度”的维度考虑另外两个相关维度。在2016年“2·19”讲话中，习总书记提出“高举旗帜、引领导向”“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精辟见解。舆论导向须引领，担当此重任的是马克思主义。高举此旗

帜,对导向进行引领,导向正确才有根本保证。在坚持正确导向方面,对任何传播媒体、报道方式、传播形态、传播对象,无一可以例外。舆论监督是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习总书记在“2·19”讲话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笔者认为:舆论监督并非可有可无。它同样可以起到舆论引导的作用,不是正面宣传所能取代的。两者应同时存在、殊途同归,统一于“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目标之下。

(二) 党性和人民性关系问题上的创新发展

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原则,这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此,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对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构成挑战的因素。例如:客观上,金钱拜物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盛行起来,对此应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主观上,社会成员包括新闻工作者的物质欲望易于被外界因素激发并由此而膨胀。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要义之一是要抵制物质利益的诱惑。

在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问题上,过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过一些问题。在理论上,对人民性有所忽视,主流语境中在较长时间内讳言人民性;在实践中,部分媒体对党性原则坚持不力,这与存在“阶级性淡化情势下何必还要强调党性原则”的误识有关。习总书记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就是一致的、统一的”重要论述,引导我们更全面、更正确地认知党性和人民性及其关系。

(三) 重视新闻传播规律和其他相关规律

胡锦涛在担任总书记期间,提出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提新闻传播规律,其意义深远。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符合新闻传播规律,方能获得预期的良好效果。习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讲话中,要求在实行媒体融合时同时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来说,无疑应当各自遵循自身应当遵循的规律;因为是进行媒体融合,故而传统媒体应顾及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新兴媒体也应顾及新闻传播规律。这是媒体融合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习总书记提出必须遵循的规律还有: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网络传播规律。以上四种规律既紧密联系,又存在一定的区别。对新闻传播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研究深化的表征。新闻传播学者已经对上述四种规律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 将媒体融合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指明了“媒体融合”方向(这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必由之路)。“媒体融合”由此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主流媒体要在媒体融合中当主动者,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实现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这是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情势下的有效应对之举,更是推动主流媒体转型、创新、发展和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在中国知网网页,在主题栏中输入“媒体融合”,可找到论文16476篇^①,可见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成果丰硕。媒体融合已成为新闻学界持续的研究热点。

进行媒体融合,需要互联网思维。此概念由互联网业界人士提出,习总书记将它引入新闻舆论语境,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党的最高领导人作这样的表述,这是首次。对于新闻舆论语境中的互联网思维,学者进行了学理探究,从中获益颇丰。

(五)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命题意义重大

对外传播事关中国形象和声音的传播,事关中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话语权。40年来,在对外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效变革。习总书记要求:增强国际话语权,

^① 搜索时间截至2018年7月20日。

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前者是目标，要与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状和趋势相合。后者强调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①。在中国故事中，蕴含丰富的本国文化元素。这是体现了战略眼光的传播理念，同时也是切实可行的传播策略。在国际传播中，传播话语体系的变革与创新必不可少。

（六）对创新新闻舆论工作予以倡导和鼓励

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就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从客观上说，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已成传播大趋势。为与此相适应，就有赖于在上述九个方面进行创新。而每一个方面的创新，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唯有不懈创新，才能摆脱困境、进入胜境，才能有效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七）从战略高度对新闻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要求

新闻队伍建设的目标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对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要求是：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成为专家型、全媒型人才；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在一系列问题中，抓住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同时从政治、业务、作风等方面提出了全面要求，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路径非常清晰，切实可行。习总书记为新闻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其论述具有学理高度和学理内涵。

综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新闻学增添了许多重要内容，习近平新闻思想尤其是如此。而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作研究，则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童兵教授就习近平新闻思想提出把握其“精髓”的命题。他认为：习近平新闻思想的精髓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要概念、标志性学术话语的解说；二是对传统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和发展；三是对一些国外的、历史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学理和方针的认知、理解、表述的中国化，即运用中国特色新闻学术话语加以“改译”或“新说”。^②其“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精髓”的观点值得引起重视。

三、新闻史学：研究领域拓展且体现出相当深度

新闻史学（历史新闻学）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在新闻学的这一支脉上，同样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发展景象。新闻史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甘于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的学者大有人在。高质量的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在教育部历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屡屡获奖就是明证。

（一）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的拓展趋向

新闻史研究的拓展表现在：从报刊史拓展为对各种媒体、媒体形态发展史的研究，由中共报刊史拓展为包括国民党的报刊在内的史的研究，由对报刊的单一研究拓展为对各个方面的研究。此前基本上就是党的革命报刊史研究，其他的研究主题也要往革命上靠。现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从单一的中共报史研究扩展到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党报史的研究。几个较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比如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研究，港澳新闻事业史研究，海外华人报刊史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报刊史研究等等。另外，地方新闻史志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不少省市都建立了专门的机构，组织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成为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重要报纸刊物的历史的个案研究和

^①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② 参见童兵：《把握习近平新闻思想精髓》，《解放日报》2018年7月17日。

新闻界人物——著名报刊活动家、著名报刊政论家和名记者的研究，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这方面的成果最为丰硕^①。以上是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方先生所言极是。

从单一的中共报史研究扩展到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党报史的研究，这就使得不该被忽视的研究内容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史的其他研究的主题不再往“革命”上靠，有利于还原历史原来的模样；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其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特色鲜明而未受应有重视的；地方新闻史过去是“短板”，这方面的补缺性的研究自然是十分必要；新闻史中的个案研究和杰出人物研究至关重要，这方面的成果值得称道。除此之外，民国新闻史、中国互联网发展史、图像传播史等方面的研究，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大致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对具有研究价值的中国新闻史的各个方面，新闻史研究学者都已涵盖。另一景观是：口述史作为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在新闻史研究中也得到了应用。

有学者通过对 1979—2014 年 35 年间（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来 35 年中）以新闻史为主题的 1 857 篇中国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后发现：中国新闻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内发文量、研究者人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形成了一批稳定的、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研究队伍；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主题聚焦化；得到的外部支持有较大改善^②。此文当属于对新闻史研究的研究，其基于统计数据所提出的判断有一定道理。此文可为上文提及的方汉奇先生的见解提供佐证。

（二）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的深化趋向

其主要表现是：涉及的某些研究内容体现了深度，例如恢复历史真相原貌、触及研究对象的深厚底蕴、思考史料背后的深刻内涵等。

在 40 年中，还出现过对新闻史研究的专门的学术讨论。其中，2007 年围绕新闻史研究展开的讨论引人注目。不少学人对过去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批判，构成该年度的研究重心。同时，个案史、专题史、新闻界人物和具体的史实考订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一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了新闻史专家笔谈，将他们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的思考刊发于《新闻大学》上，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一阵热潮，同时也构成了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表达了学者们对新闻史研究的自省和期待^[2]。其实，对过去的研究进行自省，这本身就体现了学理思考的深化，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四、新闻学的未来发展：必须解决好若干问题

新闻学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解决好如下问题^{[3][4]}：

一是与传播学协同发展。传播学是与新闻学关系最为密切的相邻学科。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西方传播学传入中国。它在传播对象、传播过程、传播方法、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方面研究颇深，因而备受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的关注。传播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知识、理论被融入中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之中。在经过多年凝练和发展以后，传播学和新闻学共同支撑起以此命名的一级学科。这堪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之一。而因传播学的崛起，新闻学也遇到了很大挑战，一度曾出现过欲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和“保卫新闻学”之争。就此展开学术争鸣，有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发展，有利于新闻学学科反思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认

^① 参见《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方汉奇先生治学答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李红祥、王婷婷：《1979—2014 年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 CNKI 数据库》，《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 4 期。

为：两者协同发展，则可以互利；两者互相轻视，则可能俱伤。

二是建构学科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必须系统、科学、完整。在建构新闻学学科的科学体系时，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新闻学与政治的关系。众所周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中，新闻学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正如季为民研究员所说：“新闻学作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学科，能否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反映新闻实践的规律，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5]否定政治对新闻学的影响，是没有道理的；刻意回避，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不符合客观实际。但倘若用政治取代新闻学、以政治冲淡新闻学的学术含量，则同样是不可取的。

其实，早在近 30 年前，习近平在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便曾经就新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发表过很有启发性的见解：“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①在这里，如下意思表述得非常明确：其一，新闻学是一门科学（不能视新闻学为无学问和非科学），与“新闻无学”划清了界限。其二，新闻与政治的关系虽然很密切，但并不能将新闻等同于政治（两者存在紧密联系，但不可视为一物）。其三，为政治需要而牺牲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断不可取的。

三是进一步提升对决策部门、新闻业界、其他学科和教学对象的影响力。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包括实际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力，主要是实际影响力；对其他学科和教学对象的影响力，主要是学术影响力；对新闻业界的影响力，则是两种影响力兼而有之。当然，两种影响力往往并不是截然可分的。

40 年来，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不断有所提升。现在它已经成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 11 门学科之一。要确实能充分发挥它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作用；发挥这种作用，也就包括了上面所说的影响力。

以上影响力，既表现为对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的解释力，又表现为对正在进行的实践的指导性。对实践无解释力和指导性可言的新闻学终究是不可取的。陈力丹教授说：“新闻学应能够阐释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闻传播现象，如果不能有效地、令人信服地予以阐释，那它存在的合法性（多年来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的质疑，其实就是对新闻学合法性的质疑）就会受到质疑。”^[6]

四是探索新闻学学科的发展规律。这里所说的学科，是人文社会学科（有别于自然科学学科）。学科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我们须潜心探索和正确认知。具体到新闻学学科发展规律，则既包括各学科都应遵循的普遍规律，又包括新闻学科自己的相对比较独特的特殊规律。

按照列宁的观点，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7](P161)}。我们可以循着这一思路去探究新闻学学科和其他各学科都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在这里，尤为重要的是本质之间的这样三组关系。其一，学科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如下关系是合乎规律的：研究紧扣对象展开，对象为研究提供内容，从对对象的研究中抽象出科学理论。其二，学科与外部因素的关系。此处的外部因素，是指对学科有着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外部因素，例如政治、经济、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学科发展不是孤立现象。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其三，学科内部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学科内涵、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等。具体是指：学科中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的关系及其与整个体系的关系。这是内部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一部分规律又被称作内在规律。

新闻学学科发展，除了遵循上述普遍规律以外，也还有着相对特殊的规律。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新闻本体、新闻媒体、新闻实践、新闻事业等。这些对象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① 参见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在这方面，它比其他一些学科（例如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艺术学等）的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党性原则不仅在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中被不断强调，而且在新闻学学科建设中显得至关重要。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与时代、与社会联系紧密。习总书记说过：“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这应该可以给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以遵循规律方面的启发。

行文至此，笔者想借用郑保卫教授的一段话对全文进行小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学坚持立足当代，在继承以往工作传统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面向未来进行理论总结和学术创新，适时回答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新闻事业所面对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观念和思维创新开始，形成了包括体制、机制、形式、手段、路径、方法在内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解决了新闻工作如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为民族和谐团结服务，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服务，以及如何实现传媒业自身改革发展等问题。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是为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发展进步，以及促进我国传媒业改革创新服务的。”^[8]

参考文献

- [1] 李良荣. 新闻改革 30 年: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J]. 新闻大学, 2008(4).
- [2] 童兵, 夏德元. 2007—2008 年中国新闻学发展报告[J]. 中国传媒报告, 2009(2).
- [3] 丁柏铨. 中国新闻理论体系调整之我见[J]. 新闻大学, 2017(5).
- [4] 丁柏铨. 新闻学学科建设:明确目标与探究规律[J]. 新闻与写作, 2018(5).
- [5] 季为民.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正当时[M]. 人民日报, 2018-05-28(16).
- [6] 陈力丹. 新闻传播学研究必须与互联网的传播环境相适应[J]. 新闻记者, 2017(9).
- [7] 列宁. 列宁全集(第 3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 [8] 郑保卫. 中国新闻学百年回望与思考[J]. 新闻与写作, 2018(1).

Research on Chinese Journalis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Macro Background, Subject Connotation and Future Trend

DING Bo-qua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Chinese journalism and its various branches (applied journalism, theoretical journalism and historical journalism) have developed in parallel with the economic society and journalism practice. The content of the subject has been enriched and the research level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has a grand and profound backg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practice has provided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China.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journal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journalism. The future direc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with communication study; second, constructing a more scientific system of discipline; third, further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n decision-making departments, journalism and other disciplines; fourth, exploring the law of journalism development.

Key word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Chinese journalism; journalism;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刘传红)